

《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的策划初衷

金磊

建筑与文明是关联的,中国现代建筑的先驱之文脉坚守,早有立足高远的论说。1931年创刊的《中国建筑》的创刊词就明确“建筑之良窳,可以观国度之文野。”它是留美归来学人赵深所言,体现了中华民族建筑文化自强之目的。可见,建筑与国家,建筑与城市文明息息相关。建筑作为表现城市文明的载体,尤其百年中国现代建筑是中西文化互鉴之果,是充满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标志物,20世纪遗产给量大面广的城乡既有建筑的活化利用带来机遇与挑战,保护传承好20世纪遗产可彰显中国现代建筑的精华。

对于本书,中国文物学会单霁翔会长表示:《导读》一书是在全国业界与公众中,“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大势下产生的,20世纪建筑遗产的知识与价值传播,也许以其时代特征及国际影响力,较传统建筑,对于增强历史文化自觉有更直接的意义。何为20世纪建筑遗产?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并保护20世纪遗产?那些曾经在我们身边的城市建筑与街区,何以成为具有历史文化记忆和科学技术价值的瑰宝?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人和事?代表国际潮流的《世界遗产名录》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建筑的,这些问题成为以现当代建筑遗产的名义,解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的认知。

“导读”20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

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作为《导读》一书主编单位,旨在从理性上向业界内外讲好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故事”。《导读》一书集中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20世纪建筑遗产何以成为面向世界文化遗产的新类型,二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有丰富的遗产价值与内容。它回答了如何在遗产认知中密切20世纪事件与人;如何坚持国际视野且借鉴世界遗产的先进经验;如何在20世纪遗产的历史文化长河乃至科技进步价值阶梯上不断提升。《导读》细解了何为中国20世纪遗产国际性的中国标准,展示建筑文博乃至艺术设计界在百年城市历程中的时代特征,表现20世纪经典建筑杰出建筑师、工程师的创作观,反映20世纪建筑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电梯、玻璃、钢筋混凝土乃至智能技术)的变迁,对现当代建筑发展的技术支撑。事实上揭示出中国建筑文化自信自强的20世纪建筑思想史、建筑文化的价值。《导读》一书的重点内容至少有三方面:一是面向中国同行与公众介绍《世界遗产名录》的20世纪遗产项目;二是对比与世界同框的中国20世纪建筑设计特色与背景,向国内外介绍中国建筑师与工程师的风采;三是不仅为中国补全遗产类型而努力,还在国际建筑遗产平台上赢得话语权。

作为本书的主编我相信,《导读》是让世界领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瑰宝的“窗口”,也开启着中国现当代建筑科技文化的魅力之旅,它让更多人有机会“阅读”最生动、最可代表城市发展年轮的“教科书”,还有助于强化城市集体记忆,并成为可读、可讲、可延伸的20世纪建筑遗产“启蒙书”。

20世纪城市与建筑历程,一直以文化自信自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



激起人们心底最深沉的认同。当步入中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民族实业家张謇(1853-1926)开创的诸多近代中国第一就呈现在眼前,它为南通文化城市建设留下“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基因。张謇不仅是出色的实业家、教育家,还是一位建筑行家。有记载自1902至1926年,从南通到他的故乡海门长乐,共创办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共370多所。据研究张謇思想与活动的史料,他还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筑文化,并不断吸纳西洋建筑先进技术为中国建筑所用。

“导读”20世纪建筑遗产的理论与实践

马国馨院士在书序中除讲述20世纪建筑遗产的可持续性,分析在遗产保护中正在面对的瓶颈,还介绍了一些国家正在实施的“可持续遗产保护计划”及不同国度由国家支持开展的20世纪遗产保护的“文化工程”。他认为,作为遗产学的学科研究,也要注意公众对20世纪遗产的接受程度,一方面要采用遗产的图像化手段,因为20世纪建筑都是长期真实存在的物质实体,而图像技术可以提供最直观、最快捷、最真实的视觉信息;另一方面要启动遗产传播的文化化,将20世纪遗产的研究成果通过选择和简化,以文学、故事的形式对史学和专业的内容及语言进行改编,从而使遗产中的历史记忆更加生动且精彩。

《导读》中笔者曾以2018年英国17个后现代建筑遗产项目入选建筑遗产的事例,解读当代社会的遗产价值与引导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建筑的遗产认知年限在“30岁”之下,它充分说明自1947年开始的英国现代建筑保护已经在国家层面及非政府组织方面有了制度。据“历史的英格兰”官网表示,在英国建筑史上,体现建筑美学的项目,只有通过载入名录的方式保护,它使大量有价值的20世纪建筑拥有无可争议的传承理由。ICOMOS《关于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办法的马德里文件2011》指出“由于缺乏欣赏和关心,20世纪建筑遗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处境堪忧

科学的发掘,准确的结论

——读《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

韩华 申砚歌

2023年11月,考古发掘整整三十年的《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出版,由时任考古领队何双全先生主编并执笔,悬泉置遗址资料前后由四十余人进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整理,终于为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三十年的资料整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两次经过考古科学发掘出土上万枚的简牍材料。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甘肃居延考古队在黑河下游发掘出土的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共2万余枚;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敦煌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汉简3339枚,其中有字汉简21399枚,无字汉简12000余枚,近3500枚残断简,出土各类器物共7250件,为汉魏时期的遗物。悬泉置报告详细完整地还原了遗址发现的整个过程、考古发掘的全部工作流程、前后三年度考古人员的工作日常、悬泉置遗址的周边环境、悬泉置整个历史时期的沿革建制,从体例的编纂到资料公布的完整度来说为同类考古报告的编写树立了典范。

完整揭示悬泉置遗址的结构和功能

敦煌悬泉置考古发掘完成以后,最早详细介绍发掘情况是2000年《文物》第5期刊布的《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敦煌悬泉置汉简内容概述》(简称《概述》)、《敦煌悬泉置汉简释文选》(简称《释文选》)三篇概述性的文章。《简报》公布了悬泉置遗址的结构平面布局图,但对全部的功能和用途限于篇幅原因,并未详细说明,悬泉置报告的发布对于遗址的结构和功能有了全面详细的揭示。

关于房址27、28的功能问题 《报告》认为:“位于坞院内东北角为一组套间,F27为里间,F28为外间,中间筑隔墙,隔墙南段开套间门,门宽1.7米,F27南北长6.6米,东西宽5.2米,建筑面积34.32平方米。F28南北长5.5米,东西宽6.4米,建筑面积32平方米。室内西北角有厕所设施,从房址中堆积物泥墙碎块中的中医医疗和药方等医学文书可以确定,F27、F28为悬泉置医务室。由此推断F27为重病号休息和隔离区域,F28为药房和医生诊室。

F26房址的功用问题 《报告》认为:“F26与F27、F28相邻,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3米,东西宽9.8米,为一大开间,建筑面积约45.08平方米”,出土了泥墙题记《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由此推断,房址F26应为悬泉置接待朝廷官员和外宾的“第一次会面”的“会客厅”。

关于灰区、灰坑 田野考古中灰区或灰坑遗址就是今天的垃圾倾倒区域,考古标号为H。依据《报告》,悬泉置大的灰区共有三处,分别为坞院东门南北两侧灰区、坞院



外北侧灰区堆积和坞院外西侧灰区堆积。三个灰区5米×5米探方总共124个,占483个总探方布设的1/4,有大量简牍出土,灰区或灰坑出土大量简牍的事实证明,悬泉置存在档案销毁固定时间制度。

关于纸张遗物的年代考察

悬泉置遗址共划分6个区域,布方483个,实际发掘187个,出土麻纸550件。通过悬泉置层的科学划分并同层位纪年简的佐证,悬泉置最早应在西汉时期。《报告》表30《悬泉置遗址出土麻纸现状描述表》中有186件出土纸均为西汉时期,由此可以确定悬泉置是早于东汉蔡伦改进纸张无疑。

悬泉置出土简牍命名问题

依据《馆藏文物登录规范》(WW/T0017—2013)附录E.1《各类馆藏文物定名方法及示例》的规定,一共收录有35类文物定名方法和定名示例,没有涵盖简牍类文物命名的国家标准。甘肃汉简在以往实际运用中往往以考古发掘编号识别标准,例如:简EPF22②。完整册书一般以册书第一枚简记录的内容,后加考古编号,例如: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EPF22.1—36)。《报告》依据文书类别对简进行了命名,有明确纪年和文书名称者,以“年号+文书类别”命名;无明确纪年和文书名称者,直接以简文内容命名。例如:《诏书》:IT0114①:168。《制书》:IT0116②:4等。何双全先生为此后的简牍命名提供了非常科学的思路。故此出土

……20世纪遗产是活的遗产,对它的理解、定义、阐释与管理对下一代至关重要。”2018年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20世纪工业城市伊夫雷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曾是“苹果”品牌之前的世界最伟大的工业设计地,奥利维蒂(Olivetti)乃世界上第一款台式电脑制造者,IBM的著名箴言“设计就是好生意”的灵感也来自Olivetti打字机。

于2014年起草、2021年修订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认定标准》特别强调要关注“反映城市历史文脉,具有时代特征、地域文化综合价值的创新型设计作品,也包括‘城市更新行动’中优秀的有机更新项目等,也要重视改革开放时期的作品,以体现建筑遗产的当代性。”如果从20世纪遗产关注新中国建设成就看,20世纪遗产的确对文化城市的塑形有推动作用。对于北京,梁思成早有论述“北京城必须是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原有的整体文化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加以保存的,走到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从1959年的“国庆十大工程”的整体(已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到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八大学院”成为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截至2023年公布的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北京共拥有120余项,它们在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中助力减量发展,给古都带来创新活力。上海在20世纪的百年间,融汇中西方建筑城市事件,创造了包罗万象的建筑哲匠传统与大量隽永的城市空间。在七批人选20世纪建筑遗产的50余个项目中,体现了丰富的历史凝聚及人文精神。

《导读》中还有专门篇幅,讲授20世纪遗产中的工业遗产,以此见证了新的建筑类型与建筑风格、大胆突破的新结构形式、广泛应用的新建筑材料。工厂的烟囱、料仓、冷却塔、超体量的厂房及油罐乃至因工业发展形成的社区,都创造了20世纪崭新的生产与生活生活景观。刘伯英教授通过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中工业遗产的分布,发现被推介的工业遗产项目占总数的10%以上,他认为工业遗产不仅是中国工业化独特进程的有力见证,也对世界工业文明做出一系列贡献,是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标识及独树一帜的遗产瑰宝。他还分析了21世纪新型工业化时期,高铁、核电、航空、航天、生物、人工智能乃至“新基建”等的“赶超竞赛”,不仅使中国拥有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还以超大超难的复杂建筑推动了中国工业的高质量发展,所有研发、创新的生产基地背后都有智慧筑就的建设奇迹。

《导读》既有艺术美学对20世纪中国建筑创作的影响,也有居住、园林、科技在20世纪遗产中的变迁,在分述江苏、天津、上海、北京、广东、重庆、山东、新疆、湖北、东北三省乃至俄罗斯20世纪遗产的同时,还对中国20世纪建筑巨匠的“人和事”予以生动描述。从新时代新文化使命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探索上看,《导读》的出版或许对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也将开启新的认知与机遇。

《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

主编: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

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简牍命名须以对简文的正确认知为基础。简牍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学科很广,内容的复杂性就成为其学习和整理的高门槛,这也是简牍命名的最主要困难。

明晰悬泉置遗址若千个第一

以往通过悬泉置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汉代河西四郡置的机构非常多,一般河西四郡所辖每一县有2-3个置,而悬泉置是目前考古发现汉代第一座完整的“置”机构遗址;出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为第一块汉代泥墙题记;出土简牍中的《驿置道里簿》和居延新简中的同类简册第一次还原了汉代时期从长安到敦煌间的驿置机构之间具体距离和交通走向并且中间是连续不间断的记录。《驿置道里簿》为2014年由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三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入选成功起到关键作用,也让敦煌悬泉置遗址作为甘肃汉代丝绸之路代表性遗址成为中国汉简出土数量最大的一处遗址。从目前汉代考古出土的纸张的遗迹看,敦煌悬泉置遗址是目前出土西汉纸张数量最多的汉代遗址,有186件。

充实以往研究结论

之前的研究认为悬泉置人员编制数为40-50,马匹编制数为十几匹。《报告》通过解剖遗址并结合出土简文内容,认为悬泉置的管理体制是“县—置—乡—亭”的垂直管理体制,按照遗址规模和简文记录的常住人口400余人,其中官吏就有82人(ⅡTO215③:29),常备马匹120匹左右,常备车辆50余辆,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也只有这样规模的工作人员编制,才能应付一天最大量一千余人(ITO309③:134)的接待。

汉简内容是百科全书,但其出土后零乱和碎片化的特性也给学界带来研究方面的片面性。《报告》的全文发表,对悬泉置内容的整体化研究、悬泉置机构实际用途和内部功能的正确认知以及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域诸国的有效管理的研究有很强的指导性。

(作者单位:甘肃简牍博物馆)

《敦煌悬泉置遗址1990~1992年田野发掘报告》

编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简牍博物馆 敦煌市博物馆

主编:何双全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

■新书评论

辨字知物,传承中华文明基因——评《一词一世界》

宋向光



齐吉祥先生的又一部著作呈现在眼前。翻开书页,仿佛听到齐先生亲切的声音,还是那么热情、生动,不疾不徐地把中国古代文物独特的表象和文化内涵娓娓道来。读者伴着齐先生的声音“穿越”到历史的某个时刻,置身于古人生活的某个场景,观看先民一笔一画地绘制陶器上的花纹,一枚一线地编织锦缎上的龙凤。

在书中,齐吉祥先生从汉语词语词义演变的视角,选取现代汉语中常用的50个基础词语,这些词语涉及社会制度、农工生产、人际关系、品德修养、劝学励志等方面。齐先生从词语的当代含义说起,追溯与词语相关的古代文物或社会现象,解说文物在材质、功能或制作技法等方面的特点,解释文物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些以实物为参照的词语,可以说明客观的物质现象,还可以说明抽象的社会关系和人类思想。齐吉祥先生对汉语词语与古代文物关系的生动解读,丰富了我们对于古代文物内涵的认识,深刻揭示了物在中华文化中的基础和构建作用。

文物是博物馆的基础性构成要素,观众借助文物感知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博物馆中的教育活动都是以文物为媒介开展的。博物馆中的文物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物,一类是人工物。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中的自然物是经过人为采集、记录等才进入博物馆的,但其外在没有受到人为的影响。人工物通常是人为改变其物质成分构成、结构形态,以满足人的生产、生活需要。人制造了人工物,人工物也形塑着人的生产、生活。深入发掘和普及博物馆中文物的内涵及意义,是一代又一代博物馆工作者的责任。博物馆工作者基于科研成果及探究目的,基于不断完善和丰富的研究技术,持续深化对文物的认识,不断拓展文物的利用范围,为观众提供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齐吉祥先生在多年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中,注意到汉字与器物之间的关联,注意到汉字字义在使用中发生的变化,从而触摸到中华文明的独有特点和底层逻辑。汉字是独特的文字系统,据考古资料记载,甲骨文字和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和语言系统,其后尽管汉字的字形、含义发生改变,但都有迹可循。齐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字词是联结文物与中华文明的纽带,在实践中摸索出“文物一字词—历史—文化—育人”的解读链条,让静止的文物“动”起来,揭示出文物是历史见证者和文化构建者的功用。

2000多年前,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造字方法有“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此后不久,许慎总结前人成果,编写了《说文解字》一书,提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方法。班固提出的造字法体现了早期造字多模拟具体物象或客观现象的情况,强调文字所指称对象的客观性。许慎则关注用文字表达客观的物象或现象的具体做法,强调文字的自身特征以及文字内涵的不同属性。从班固到许慎,其间不足百年,但他们对汉字与指称对象关系的认识却发生显著改变,从真实表现指代对象到强调造字标准和文字的内在逻辑,从客观表现到主观表达。尽管二人对造字方法的理解角度不同,但都认可指称对象对汉字形态、内涵及其用法的影响。随着汉字指称对象的历史演变,汉字内涵及其用法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文物可以清晰表现出来。

汉字将指称的客观对象与表达的主观认知有机结合起来,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古人的思维方式。古人用具象的物或现象表达抽象的概念或情感,反之,古人也可以将抽象的内容用具象的物或现象表现出来,即“比兴”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比兴”对中国古代叙事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物在推动论说深入展开或者在艺术作品叙事发展中的作用。当然,汉字的这一特点也为博物馆文物的解读开辟了有利的路径,从具象的物,到抽象的知识,再到品德的升华,从而达到丝滑转换、无缝对接的效果。

博物馆工作者在多年的解说实践中,能够激发观众的参观兴趣,激励观众主动探索展品相关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信息,让观众在探索中增进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博物馆工作者的解说工作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与观众一起,一步步深入展品的知识宝山,移步换景,从身边的每一件展品开始,仔细观察和认识展品的特点,了解展品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将过往与当下展品起来,将展品个体与整体联系起来,构建包含真实物证、亲身体验、抽象知识、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的综合记忆。博物馆工作者的解说工作得益于汉语语言的物与概念共融的特点,以物的构成物质、方式、形态及功用为标尺,拓展到人的行为或社会现象,跨越物理、社会、文化的界域,寻求物品、概念、价值的共同点和联系点,将事实抽象为知识,升华到人的道德规范。在博物馆工作者解说实践中,物是对象,是知识抽象的起点,是联结多元知识的纽带。

《一词一世界》是一本写给小读者的书,也是写给博物馆专业人士的书。齐吉祥对汉语词语含义与古代文物特点的关联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润物细无声”,书中的一个个词语,既折射出古代文物的深厚内涵,也记录着华夏文化的演变发展。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文物和文字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实证。小读者可以从书中看到古代文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感受到中华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体会到古代与当下文化的紧密联系,更可以感受到华夏先民的创造力。对博物馆专业人士来说,他们则可以从齐吉祥先生对文物的解读中,认识到文物的内涵会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增添新义,文物与华夏文明叙事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与文物和历史事件有关的词语,就是先民为我们留下的一把“让文物说话”的钥匙,是破解华夏文明千年延续、历久弥新密码的重要线索。

《一词一世界》(全2册)

作者:齐吉祥

出版社:新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2月